

■第一视点

□姚章

“我3点钟左右开到引桥上,现在我还在引桥上。”5月2日下午5点45分,堵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小崔,瞄了下车子的仪表盘:近3个小时只开了5公里。5月1日23时58分杭州湾大桥试运行通车,由于大批观光车辆涌上大桥,不少车辆违停、慢速行驶、停车、下车观赏风景,造成严重拥堵。

治杭州湾大桥有简洁之法

一曰“区别对待”
将过往车量分为两类:一类为意在观光者,一类为意在通行者。各固定专用车道,不许变道行驶。并分别采用差别收费标准,观光车因速度慢,影响通行效率,故应采用较高收费标准。

二曰“善用价格杠杆”
以经济学角度观之,杭州湾大桥拥堵的症结乃在“供不应求”四字。如何解决“供不应求”?二

法:一是增加供应,再建一座桥;二是提高价格。再建一座桥,空口说白话,而提高价格则可信手拈来。价格提高到何种高度而后止?提高到“供求平衡”而后止。

三曰“实施特别管制”
特别路段,特别情形,须实行特别管制,方能保道路畅通。管制须严厉,许可与禁止须分明,违者施以重罚。

■文化镜像

□孤云

柏杨走了,柏杨是谁?

那个叫柏杨的老头子死了。挂在MSN上,有人特意来告诉这消息。看来,还有人记得这位孤岛文化斗士。不过,想必也不多吧。特别是现在那些80、90后们,能称得上郭衣洞这个名字,又大致了解什么是“大力水手案”,简直算得上少年才俊了。

也正常,时代不一样了。年青一代(这么一说,我真的老了)生长在市场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再也不必为窗外飞进什么妖蛾子而大惊小怪。“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他们看得还少吗,何况是一个文化人的长篇牢骚,如果他们居然还对《丑陋的中国人》感到震撼,这二十年来的光阴,岂非虚度了?

但,还是很怀念阅读柏杨的时光,虽然这仅仅对于个人而言。记忆如此不可靠,乃至现在已想不真切,自己究竟在哪一年看到这本薄册子。脑海里,只晃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盗版书,而且也不记得这书是从哪里借来的。那时候年纪太小,所以读到“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等字眼,仍旧懵懵懂懂。倒是记住了一些新鲜词汇,比如说什么中国人单独的时候像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之类的。至于何谓“酱缸文化”,那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反刍,才逐渐明白的。阅读,往往不仅需要阅历,还需要经历。所以,柏杨对我而已,并无多少思想启蒙作用。

可也就是从柏杨那里,我才开始了解台湾作家,比如李敖、龙应台等人。从这些人那里,方才完成了整体而言的思想启蒙。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将这三个人称作“台湾思想三家”。这当然是比较笼统的说法。严格来讲,这三个人都不能称之为思想家,最多只能算作“公众思想家”。更为确切地讲,这三个人都仅仅是作家而已,而从他们对读者的思想启蒙意义而言,方才勉强得以位列思想的讲席。

大概是这缘故吧,虽说《丑陋的中国人》曾是一枚文化炸弹,但柏杨的作品后来似乎并不太受人待见。至少个人感觉,他把文化匕首不够锋利、不够有力。本质上讲,他的思考可能更接近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源头。可在这浮躁的年头,谁愿意花时间从头梳理中国文化的病症?那些洋洋大观的“拿来主义”,还让人眼花缭乱呢。

柏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总是那么地不合时宜。可也有一个说法,叫作“独立精神”。这一点,在柏杨身上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他自己也说了,“不肯听话”正是他自己性格最大的弱点之一。试想,现在也许没什么人记得这位老头子,可要是有人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恐怕还是要被那些愤青们的唾沫淹没。说到底,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柏杨所定义的那个“文化酱缸”。这也是柏杨值得让人怀念的地方。

柏杨走了,那个曾经的文化大力水手走了。说实在的,个人并不觉得特别的哀伤。前两年,出版社送了一套三卷本《中国人史纲》,拿到手后随即束之高阁。也许,这时候取出来阅读,正是对这位作家最好的纪念。

■图说说图

□郭松民



为“迟到席”喝一声倒彩

陕西汉中市政府日前集中制定出台10项工作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规定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将增设“迟到席”,凡迟到的参会人员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含羞入座(5月4日《新京报》)。这一举措,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竞相用铁腕整顿会风的潮流又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虽然制定这条规定的初衷不能不说不好,但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过是一种舍本逐末之举罢了,并不见得就能提高会议效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任何一个会议来说,会议内容才是“本”,而会风只不过是“末”。如果会议的议题本身就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开的会,则即便是大家全都准时到场,而且自始至终都精神饱满,那这样的会议也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只能是一种“有效率的浪费”:浪费公款,浪费时间,浪费电视镜头和报纸的版面。对于这样的会议,“迟到席”与其说是一种羞辱,毋宁说是一种荣耀了。

实际上,一个会议是不是真的有效率,并不在于是不是没有人迟到,而是取决这样几个因素:会议的议题是不是从实际当中来的?是不是具有现实针对性?是不是有讨论的价值?会议者的召集者在开会之前是不是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和梳理?会议在进行过程中能不能允许与会者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原则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在形成决议时能

不能真正按照民主的原则进行表决?能不能同时提出保证决议落实的有效措施?等等。

所以,一个真正自信的会议召集者,是不会愿意搞“迟到席”这类舍本逐末的花样的,因为他深信迟到本身就会对迟到者构成惩罚:第一,他可能会失去对制定重大决策的参与机会,失去对一些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的表达、表决的机会;第二,他可能无法真正领悟会议的精神,而在执行过程中出错,导致自己最后被追究责任。

这样的道理并不复杂,但为什么我们在各地整顿会风的行动中,却鲜见有领导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而大量的却只在形式上做文章(比如对迟到者进行录像,在电视上曝光,比如让打瞌睡者当场站起来等等)呢?

也许这样的结论更接近实际:会议的召集者本人也并不意味着会议的内容,而只在会议的会风。因为他赋予了会风以新的含义,即把会议当成了展示自己权威的舞台,把会风当成了检验自己权威的晴雨表:如果自己召集的会议,没有人敢于迟到、打瞌睡,那就证明自己是权威的,反之则意味着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藐视,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越是空洞的会议,反倒越具有检验的价值——文山会海之所以会泛滥成灾,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如果有一天,有哪个地方的领导宣布:我召集的会议,凡是认为没有意义的,都可以不来,而且也不追究缺席、迟到的责任,那我倒真的要为他喝一声彩了。

■即时观察

□杨耕身

责任政府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

阜阳市手足口病疫情截至5月2日已累计发生报告病例3736例,其中痊愈1460例,死亡22例,重症30例,病危12例。患者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6岁以下儿童。据报道,阜阳市手足口病(EV71感染)防治工作指挥部日前向全市下发通知,要求全力做好困难群体手足口病治疗救助工作,并规定手足口病患儿医药费可报销。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阜阳市市长孙云飞说,绝不能让任何一位患病儿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看不起病。

我们关注阜阳,并且为那些得以痊愈的生命而欣慰、那些不幸夭折的生命而悲痛,为那些仍处于重症与病危当中的生命而揪心,由此,也更为期待阜阳市能够在经历疫情初期的慌乱之后,做出更为积极有效

的应对。无论如何,当手足口病疫情已经成为不可遮蔽的事实,而且在国家卫生部表示“今后一段时间部分地区的手足口病疫情还可能上升”的情形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阻断其进一步的传播,同时,如何尽最大可能地救治已经被病毒感染婴幼儿患者,挽救那些处于病毒折磨中的“6岁以下”的生命,就成为重中之重。应该说,阜阳市市长孙云飞表示“不让患儿因家庭困难而看不起病”,是面对疫情之时务实而积极的态度。

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应当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已经是文明的常识。就在几天前,国家卫生部已正式将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在这种情形下,不让患儿因家庭困难而看不起病,也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疫情汹汹,只有积

极尽责的政府才能更有效地使公民的生命免于被耽搁或受到再次伤害,才更有效地防控疫情的传播。在“非典”事件中,我国曾出台相关费用减免政策,比如对农民(包括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这些政策的施行,有效防止了因看不起病而拒绝诊治导致更大面积的病毒传染现象。显然,在手足口病疫情的发生已有些时日,其他省份也开始出现疫情的情形下,不应仅有阜阳一地做出有关治疗费用减免的公开承诺。

政府对责任的承担,意味着向病毒争夺公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责任政府是对民众生命安全最有效的呵护,因此每一起公共事件,归根到底都是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

更是对政府责任的考问。在阜阳市手足口病疫情发生之初,人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当地是否有迟报或瞒报行为?同样是出于对政府责任的追问。当疫情成为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条责任之链,这个链条不仅关系着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也更维系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可想而知的是,假设当地政府真的存在迟报、瞒报或谎报现象,无疑延误并助推着疫情的传播,并一再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关口后移,直接使民众只身冒险。

正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刻会发生,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政府责任的担当。“责任政府”从来不是只挂在嘴边,写在报告上,必然是具体而微地反映于日常的恪尽职守中。信息的公开,积极的救治,皆在此列。